

衛禮賢、愛默生與美國人眼中的孔子

張東寶*

一

德國傳教士衛禮賢(尉禮賢, 1873-1930年), 曾師事清末大儒勞乃宣, 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繼1911年出版了由他譯出的《老子》一書後(該譯本細緻優美, 被認為是最接近原文精神的版本), 又於1913年在中國青島建立了“尊孔文社”, 其陣容非常強大, 幾乎匯集了晚清最重要的學者。

衛禮賢在闡述“尊孔學社”的宗旨時指出: “我們那時的想法是為了未來拯救那些已經處於極度危險狀態下的中國文化的瑰寶。通過翻譯、講座以及學術出版的方式, 在東西方的精神領域建立聯繫, 並進行合作。康德的著作被翻譯成了漢語, 中國的經典也被翻譯成了德語。我們希望, 在遠離中國革命風暴的青島能夠做一些建設性的工作, 青島位於山海之間, 悠閒寧靜。”故而, “尊孔文社”並非單向地弘揚孔子的學說, 而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機構。

衛禮賢的夫人薩洛莫在其回憶錄《衛禮賢——中歐間的精神紐帶》裏闡述道(這也是衛禮賢與尊孔文社其他成員的共同聲明): “從中國的整個歷史來看, 它從來沒有過國教。孔子也未想到過要建立一種新的教派。他無非是要傳承與神的永恆意志相一致的保障人類社會秩序的偉大法則。他沒有要求成為宗教的創始人。他僅僅希望傳授真理, 並指明在世間達至秩序與和平之道。整個世界只有一個真理。不存在任何界限可能將真理限制在某些人組成的特別的集團之中, 這些人僅屬於某一特定的教派, 而排斥其他教派。涉及到這一真理的學說, 並不存在等級差別和種族差別。只要遵循這一學說, 不論是誰, 都會獲得真理。擁有這一生命的智慧是孔子唯一的目標。除此之外, 對他來講並不存在一個能建立起教派組織的空間, 這一組織會將其自身與人類的其他部分分離開

來。孔子沒有要求個人崇拜, 這點毋庸置疑。他確實不止一次地想到過, 想要獲得真理跟他個人建立關係是至關重要的。他要求自己的弟子除了勤奮地遵循永恆的真理之外, 別無他求。孔子真正偉大的地方在於, 他為所有的人開啓了真理的大門, 而沒有任何教派的界限。儒家學派一直到今天都忠誠於這一榜樣。儘管孔子為各代統治者所敬仰, 但從來沒有誰想到將儒家學說宣佈為國教。就像很少有某處的某人想到將空氣或水看作國家的空氣或國家的水一樣。空氣和水之存在, 每個人都可以使用, 究竟它屬於哪個國家或哪家教派, 根本是無所謂的。真理的情形也不例外。世上本沒有甚麼國家真理, 就這點而言, 如果說儒家所講述的無非是真理的話, 那它根本不能成為國教。每一類似的組織都會損害孔子的名譽, 都會限制儒家真理必然的影響範圍。沒有一個真正的儒者會認為, 對他的老師(孔子)而言, 生活在一個儒教已經降格為一個宗派的社會中, 是一種榮耀……東西方的偉大學說必然都不能作為單個國家的特別財產所擁有, 這一時代已經到來。儒家學說有很多方面對於西方社會同樣具有極大價值。因此, 對孔子的尊崇最好的路徑是使他的學說能在全世界廣為人知。”

衛禮賢對孔子學說的認識很值得我們、尤其是歷史上鼓吹“打倒孔家店”及其繼承者們的思考, 上述的一段話既是對當時想要將孔教設立為國教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回應, 同時也闡明了孔子學說的全球意義和當代價值。而且, 衛禮賢在其1926年出版的《中國心靈》一書中, 同樣對基督新教所表現出來的狹隘的教派思想進行過猛烈的抨擊。

衛禮賢還認為,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標誌着西方文化的終結和機器文明走上絕路, 而拯救西方文明的“良藥”非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莫屬! 辛亥革命之後, 儒家學說在中國面臨着嚴峻的考

* 福建省老子研究會顧問

驗。衛禮賢也指出：“不斷侵入中國的歐洲西方文化也許是它(指孔子的學說)不得不面對的最強大對手。初看起來，古老的儒家學說似乎在被迫節節敗退之後，到今天已最後終結了。但還不能作出最終結論，因為儒家學說本身具有適應現代環境的內在靈活性”。¹ 此外，衛禮賢從中國和歐洲當時的形勢出發，堅定地認為，孔子的學說理應屬於全世界，而不應當僅僅屬於中國的某一個時代。“我們現在自問道：甚麼是奠定中國和東方最深入、最根本的力量？東方給我們提供的決定性的認識是甚麼？東方的哪些光亮照亮了西方及其發展？我們進一步可以問道，在中國的古文化遺產中正在發生哪些變化，從目前的狀況下可以預見哪些結果和變化？西方能夠為這些變化提供準則和解釋嗎？”正是帶着這些當代的問題意識，衛禮賢開始到孔子那裏去尋求答案。

衛禮賢的成功之處在於他是以前問題意識作為出發點，對中國的傳統思想進行轉化，這正是傳統對於我們今天來講的意義所在。早在 1900 年左右，世紀轉折時期的歐洲感傷主義者們試圖在文化危機之中拋棄日益趨於沒落的西方文化，轉而研究遙遠東方的思想，即來自印度和中國的思想。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自己的文化，從前常常被他們一貫鼓吹的西方文明開始腐爛變質。“中國作為西方世界想像中的對應物和救世主選中的拯救對象，在騷動的歐洲知識界不時起着或永久或臨時的振奮和拯救作用”。² 《西方的沒落》一書的作者斯賓格勒，以鋒芒逼人的筆端道破了普遍不安的社會心態。他建議歐洲的知識分子應當把視線移到東方，以擺脫自身的困境。他認為，西方文化所面臨的不僅僅是危機，更是沒落。正因為此，衛禮賢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介紹在德國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孔子的學說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的重要思想，由“軸心時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類精神根基、傳統宗教——倫理價值體系框架，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被超越，它們仍然是幾大文明體系中的價值和行為準則。正是由這一時代所奠定的文化精神，成為此後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以西方為例，文藝復興的人文啟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和世俗化運動、現代科學技術的理性精神、啟蒙時代的社會契約理念等等，無一不是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地從軸心時代汲取精神的力量：“至今人類依然靠着那時所產生、所創造以及所思考的東西生活。每值新的飛躍產生之時，人們都會帶着記憶重新

回歸到那軸心時代，並被它重燃激情。從此之後，情況就是這樣；對軸心時代力量的回憶以及復甦——復興——為我們提供精神的振奮。對這一開端的回歸乃是在中國、印度和西方一再重覆發生的事件。”

今天我們常常談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這肯定不是儒家學說中恆古不變的名教綱常，而必然是從當代的問題意識出發，對傳統資源的再闡釋，只有這樣才能對我們今天的社會有所啟發。“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³ 20 世紀意大利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的本質就在於其當代性，因為人類活生生的興趣，絕不是對於已經死的過去之興趣，而是對當前生活的興趣。也就是說，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哲學家都應當從現實出發，運用批判精神從史料中選擇對於我們今天依然有意義的東西。他強調，應用具有時代精神的思維去理解和把握過去的文獻。歷史對我們來講畢竟是過去的，但我們必須用當下的精神去進行反思，用新的眼光去審視。克羅齊於一九一二年在龐達尼亞科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惟有當前活生生的興趣，才能推動我們去尋求對過去事實的知識。因此那種過去的事實，就其是被當前的興趣所引發出來而言，就是在響應着一種對當前的興趣，而非對過去的”。

我們之所以去關心歷史人物，對古代的文化遺產感興趣，是因為這些與當下的現實生活有關係，不然的話，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遺產，我們為甚麼單單對老子、孔子及其思想產生興趣，是因為他及其思想涉及太多我們現實的生活。

按照克羅齊的觀點，我們對歷史的思考，是將之納入我們當前的精神之中，沒有當代的精神，就沒有歷史。克羅齊並不認為歷史事實本身會說話。說話者正是歷史學家的思想或精神活動。要真正認識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就只能不斷地去思考前人的老問題，並且還要思考自己思想所面臨的新問題。

在面對儒家思想的時候，衛禮賢思考的問題是如何賦予這一古老的文化遺產以具有活力的新形式。

“從某種意義上說，形式與內容是統一的，不能機械地分割開來。宋代理學就是這樣，它並不只是對古代經典儒學的機械革新；明代王陽明的理想主義神秘學說是對儒學的又一次改造。如果今天能成功喚起儒家學說，那將意味着其發展的又一個新階段。但孔子的秘密正在於此：正如他毫無偏見地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化並為之注入新的發展潮流一樣，其影響也始終在於帶來新的活力。它所代表的這種精神啟示迄今還在繼續發揮作用，問題僅在於是否有合適的人選發展

之”。⁴ 理學是儒家思想爲了回應佛教的挑戰、應對新的問題而以新的面目出現的新思想，其經典也是基於對部分古代儒家典籍的再闡釋而成的。

實際上，孔子的學說對於我們來講並不是一堆死的歷史的資料而已，而是只有當這一學說與我們當下的思想或精神息息相關時，它才真實地存在着。人和事儘管必然外在地依附於時間和地點，但思想卻可以超越時空的局限。惟有當下的一切才能使以往的歷史重新復活，才能使過去史變成當代史。因爲儘管過去的歷史中有無數的史實，但只有我們心中的問題能使我們真正地關注某一段歷史或某一種思想，換句話說，是當下的生活使得我們的過去得以再生。因此，是當代人的問題意識使得孔子重新復活。

德國學者羅哲海認爲，中國哲學具有一種不僅對於中國本身，而且對西方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廣泛潛能。⁵ 並且提出了以哈貝馬斯的“重構”方式，來理解儒家倫理價值的嘗試：“‘重構’意味着以一種與古人之真實意圖相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對於這些意圖的理解是正確的話——對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覆述他們那些相當龐雜不清的立論；並且要根據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倫理學問題而加以充分利用。”也就是說，跟哈貝馬斯一樣，羅哲海並不認爲我們要回歸到傳統之中，而是從今天的問題意識出發，對傳統儒家的價值進行重構。

漢斯·昆與秦家懿在討論儒學的未來時，也都對其前景做了展望。秦家懿指出：“如果儒學意味着主動地發現人的價值，發現求得道德高尚甚至成聖的可能性。它持守人與人之間的基本責任和義務，建立一個以道德爲綱領的社會。它又是對現實世界的闡述，是堅持自我向超越境界敞開的形上學。這些其實都是構成個人尊嚴、自由、平等不可或缺的基礎。這樣看來，儒學傳統對中國甚至全世界，仍然是不可缺的……這樣，儒家的人本主義中蘊藏的普遍真理才能在今天這個自我中心的世界中得以完善。現代人隨意放縱其思想和心靈，已到了失去自我的邊緣，儒家的人本主義呼籲人在最深層的意義上回歸自我，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關係”。⁶ 漢斯·昆在考察了儒家的遺產後也指出：“在基督教神學家眼中，這一切意味着儒學絕不僅是個過去的宗教，而是一個生機盎然的當代精神力量，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民。”儒學在當代世界通往後現代主義共同體的道路上，究竟能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漢斯·昆列出了以下五個方面：(1)科學將不是不負責任的，而是依附倫理道德準則；(2)技術將不會奴役人類，而是讓人做主人；(3)

工業將不會毀滅人類存在的自然基礎，而是保護這個基礎；(4)民主將不會置社會公正於不顧，偏袒個人自由，而是以自由爲靈魂實現自由；(5)最後，超越物質世界的因素將再次爲人珍重——爲的是全人類的人道主義。

這樣，儒學的資源就與西方的現代價值得到了很好的關聯，儒學不僅可以同西方的核心價值對話，同時也是對西方現代性產生的問題的修正。

學者李雪濤幾年前在德國工作的時候，做過多次有關孔子及其思想的報告，基本上都是從萊布尼茨、黑格爾，乃至雅斯貝爾斯這些哲學家對孔子的接受作爲切入點，而以孔子學說對當代西方(特別是德國)社會的意義作爲出發點來談孔子。只有這樣，才能將一個外來的歷史問題，轉化成對德國人來講內在的、當下的問題。

2012年一月初，李雪濤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參加“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哲學”學術研討會，跟幾位來自歐洲的學者就目前面對復甦乏力的全球經濟，以及持續蔓延的歐債危機交換了看法。他們中的部分人已經意識到了，目前大部分歐洲人的認識還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更應堪憂的實際上是歐洲文化的危機。歐洲部分人文學者已經開始對照儒家思想對西方傳統及近現代思想進行徹底反思了。如何能夠轉化東亞的哲學使之能夠適合當代歐洲的實際，已經成爲當務之急。因此，這對於中國文化來講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問題是，我們如何將傳統的中國文化資源納入我們乃至歐洲當下的精神之中。如果我們能夠運用自己的傳統資源，來充分展開現代性，再造今日中國文明的輝煌的話，那孔子的學說就不僅適應了現代社會，也能順利地進入後現代。這一創造性轉化如果能夠獲得成功的話，那麼我們不僅找到了我們的核心價值，同時也使得這一價值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意義。⁷ 在《中國心靈》一書中，衛禮賢堅信：“也許在新世界裏，孔子思想中的某些東西註定要消亡。可是其中永恆的東西——自然與文化的和諧這樣偉大的真理依然會存在。它將是新哲學和人類新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從這個角度講，孔子真正是不朽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中國智慧成爲現代歐洲的拯救者”。⁸

二

西方學者曾提出一個非常有積極意義的問題：如何全力消除認爲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是

相互矛盾的偏見？如何促成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

美國學者顧立雅在其《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中提及，正是儒學強勢傳入法國思想界的緣故，法國“大革命”時期思想觀念才有了明顯的變化。⁹ 例如，“良心是自主的，信條是獨立的”；“善良和快樂是一致的”；“不向權威和偏見讓步”；“每一種最終達到的地步，是與《論語》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學之間具有不同尋常的相似性”。因此，“中國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原動力之一”。顧立雅還考察了西方的“平等”、“民主”與“理性”，說是均與儒學有聯繫。所謂“這種精神革命使得整個西方世界逐漸地再次朝向了東方，走向了民主”，“孔子哲學對美國民主思想發展的影響，主要地並且只可能是通過這種法國影響而表現出來的”。曾參加起草《獨立宣言》並主張廢除黑奴制度的美國思想家、科學家富蘭克林，於 1767 年抵達法國並與法國學者魁奈過從甚密，富氏對魁奈論述中國的著作進行過深入研究(魁奈認為，一部《論語》便可勝過希臘七賢。魁氏還建議歐洲應效法中國人文科學之發達，以求得自然與人文科學平衡發展)。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曾和富蘭克林一塊起草《獨立宣言》並受其影響，“根據人的才能而非名望來挑選官員”的“治國思想”，正是源於中國的科舉制度。它已成爲當今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美國紐約有個“寬容博物館”，希望世界上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夠相互對話，相互包容，以相互促進的方式生活在一起。這就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偉大思想。

也許很多人不知道，美國人竟尊中國的孔子爲“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而美國前總統林肯，卻稱美國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詩人愛默生爲“美國的孔子”，“美國文明之父”、“美國精神先知”。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1803-1882 年)，生於波士頓。他的生命幾乎橫貫了 19 世紀的美國，成爲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他的精神活動支配了整個 19 世紀美國的精神氣質。愛氏與孔子確有不少神似處，如：同樣的誨人不倦，同樣的育人有方，同樣的才華橫溢，同樣的幽默風雅。如果要說區別，則或許孔子顯得更謙和，謙和到根本不想將自己的思想著書傳世。而愛氏卻雄辯滔滔，他的文字具有萬馬奔騰、氣吞山河的宏大氣勢。他熱情逼人，思維活躍，鋒芒畢露，辯才一流。他的思想與觀點，在不知不覺中就會感染你，裹挾你，激蕩你，讓你爲他傾倒，爲他叫好，爲他癡迷。美國第 17 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曾說過

這樣一段話：“確立美國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就像雨果對於法國或是托爾斯泰對於俄國，愛默生確立了美國模式”。愛默生認爲，“追隨偉人是天經地義的”。但他同時強調：“謙和溫順的青年在圖書館裏長大，確信他們的責任是去接受西塞羅、洛克、培根早已闡發的觀點。同時卻忘記了一點：當西塞羅、洛克、培根寫作這些著作時，本身也不過是圖書館裏的年輕人”。愛氏的“依靠自我，尊重自我”、“人是自己的神”、“要讓自己發光”之思想，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而“依靠自我，尊重自我，獨立自助，崇尚個性”，也成了美國企業文化的精髓。愛氏說：“順從內心的召喚，你就是宇宙中最偉大的天才”。他相信人生的最高目標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優秀”。

愛默生在細心研讀了儒家《四書》譯本後，對孔子和中國文化十分仰慕。他認爲，“孔子是哲學上的華盛頓”，“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並表示“對於這位東方聖人極爲景仰”。他還一再引證孔子的名言——“朝聞道，夕死可矣”。

三

初到美國交流時，四川外國語學院教授張濤總覺得美國人對中國缺乏“基本的瞭解”。可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圖書館，張濤偶然翻到了一份 1743 年的《紐約週報》——當時的美國還沒有獨立。這份內容簡單的報紙只有 4 個小版，可佔據整個頭版篇幅的，居然是一篇名爲《孔子的道德》的文章。裏面對中國崇尚儒學、言必稱孔子的行爲作了不少介紹。

在那之後，張濤花了 7 年時間，在 15 家美國報紙上收集了近萬篇涉及孔子的報道，從中分析美國媒體塑造孔子形象的變遷。最近，他把這些研究寫入了一本名爲《孔子在美國》的書裏。

在美國，孔子的形象並非僅僅是一個中國的古人。美國媒體不僅會提到他的名字，還會引用他的言論，評價國內的新聞。

在當今美國，總統也需要忍受一些“來自孔子的批評”。

小布什曾經因爲言語含糊、用詞不當，被《紐約時報》撰文批評。這份美國最有聲望的報紙稱：“孔子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小布什的行爲恰恰是這句話的

確切寫照。”

在評論克林頓的性醜聞時，《華盛頓郵報》寫道：“孔子所言‘吾未見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確預見了20世紀末的克林頓事件。”

張濤在研究中發現，近代的美國總統，“幾乎每一任都會受到以孔子為標準的批評”。

當約翰遜政府應對金融危機和罷工運動表現不力的時候，媒體告誡這位總統，“孔子曾經說過，以約失之者鮮矣”，所以做事不能過於謹慎。而他的支持者也同樣抬出孔子，認為約翰遜提倡政府控制的政策與孔子的為政原則不謀而合，比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當尼克松水門事件爆發的時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名句來批判這位總統。1986年，深陷伊朗門醜聞的里根也遭受類似的指控。《波士頓環球報》提醒他，應該牢記孔子的語錄，明白“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中，“民信”最為重要。

在國內政治相關的討論中，美國人所提到的孔子，聰敏、博學，“置身事外而又善于捕捉事物的本質”。

有時候，媒體甚至會篡改、杜撰孔子的話。1951年，《芝加哥論壇報》刊登了一篇漫畫諷刺肯尼迪，配文寫道：“請允許我引用孔夫子偉大著作《論語》中的話：統治者行善不應當浪費公共稅徵收。”

相比之下，艾森豪威爾總統獲得的評價要好得多。《華盛頓郵報》引用孔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的話來概括艾森豪威爾的施政理念，甚至直接評價他足智多謀的秘書是“政治領域的孔子”。

連失業的美國工人們也需要這位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老人。他們在一首“戰歌”中這樣唱道：“孔子是睿智的古代聖人，他說我們需要維持生計的工資……”

16世紀，傳教士利瑪竇第一次把中國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介紹到了歐洲，隨後又傳到了美洲大陸。

1735年的一份《紐約週報》上，刊登了一封兩個版篇幅的讀者來信，介紹中國人對孔子的尊敬和信仰，並且列舉了幾條孔子語錄。

以張濤的研究，這是美國媒體最早對孔子的報道。

1925年，世界控制鴉片會議上，中國帶來的禮物是一架金絲屏風，上面寫着孔子的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1941年2月，重慶舉行了一場華盛頓誕辰紀念活動。美國總統特使發言時，眼尖的媒體發

現，他身後的壁畫內容是，孔子與華盛頓一起，“捍衛着世界和平”。

“當時，日本的侵略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生存危機，所以在外交領域，政府官員也極力強調孔子的民主與和平思想。”張濤說。

1937年，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對《華盛頓郵報》表示，孔子弟子所推崇的“民人”和“社稷”，其實是一種古老的“民主口號”，中國歷來愛好和平，抗日戰爭是一場“民主之戰”。

1943年，宋美齡訪美期間，多次引用華盛頓、林肯、耶穌和孔子的話，突出中國的抗戰信念，希望獲得美國的援助。在芝加哥體育場的演講中，宋美齡特別提及孔子的頑強信念，呼籲中美並肩戰鬥，“捍衛我們的理想”。一位美國小女孩向《基督教箴言報》的記者說，她覺得，對宋美齡最好的歡迎方式，就是對她高喊“孔子”。

事實上，中美關係近幾十年發展中，“孔子”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角色。

“文革”期間，為了區別於大陸的“批林批孔”運動，蔣介石每年都會高調參加紀念孔子的活動，以彰顯自己的“正統”地位。

1972年，尼克松訪華，雙方簽訂《上海公報》。當時，在美國媒體輕鬆的花絮報道裏，孔子複雜的飲食原則被拿來形容中國接待工作的細緻認真；而在嚴肅的分析報道中，媒體也煞有介事地提出，影響《上海公報》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孔子——公報“求同存異”的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對大國在亞洲的霸權主義”體現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對蘇聯的迴避，則是“孔子講求實際的寫照”。

“孔子曾經說過，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尼克松和周恩來花費大量時間，界定——或者重新界定——兩國的分歧衝突與共同利益。”《洛杉磯時報》在當時的報道中這樣寫道。

1987年，里根政府的國務卿舒爾茨訪問中國時，行程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去曲阜拜謁孔子故里。

甚至，孔子的形象還被鐫刻在美國最高審判機構聯邦最高法院的外牆上。在這座白色建築東門上方的三角牆上，刻有3個石像，分別是頒佈《十誡》的摩西、雅典立法家梭倫，以及穿着長袍、留着長須的孔子。

聯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紹中說，他們是人類歷史上最“最偉大的立法者”。2009年10月28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61票贊成、47票反對通過一項決議案，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並且讚揚儒家思想對人文

社會帶來無價的貢獻。儒家思想鼓舞了成千上萬學者，對全球各個領域做出重要貢獻。“事實上，孔子在美國只是一個符號。”張濤說，“不同的人給他賦

予不同的含義，然後各取所需。”

可以說，近 300 年來，除了中國世代流傳的孔子理念，在大洋彼岸始終存在着一個“美國的孔子”。

註釋：

- ¹ 衛禮賢：《儒家學說的精髓》，載於蔣銳編譯：《東方之光——衛禮賢論中國文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年。
- ² 傅海波、胡志宏譯：《歐洲漢學史簡評》，載於《國際漢學》第七期，鄭州：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 年。
- ³ 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⁴ 同註 1。
- ⁵ 羅哲海：《軸心時期的儒家倫理》，陳詠明等譯，鄭州：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 年。
- ⁶ 秦家懿、孔漢斯：《中國宗教與基督教》，吳華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年。
- ⁷ 李雪濤：《孔子的世界性意義》，載於《讀書》，2012 年第 8 期。
- ⁸ 衛禮賢：《中國心靈》，王宇潔譯，北京：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
- ⁹ 顧立雅：《孔子與中國之道》，鄭州：河南大象出版社，2004 年。